



朱诚如 主编

清朝通史

道光朝 分卷
喻大华 主编

紫禁城出版社



主 编
朱诚如

清朝通史

啓功題



道光朝 分卷

主 编
喻大华

紫禁城出版社

2003.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朝通史·道光朝/朱诚如主编, 喻大华分卷主编.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2.12
ISBN 7-80047-385-6

I. 清… II. ①朱…②喻… III. 中国—古代史—
清代 IV. K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2721 号

清 朝 通 史

主编 朱诚如

道光朝 分卷

主编 喻大华

紫禁城出版社出版

(北京景山前街故宫博物院內)

北京恒智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330 千字 印张 15.625

200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ISBN 7-80047-385-6/K·182

定价: 39.00 元

总 前 言

历时 4 个寒暑，由全国数十位清史专家学者辛勤撰写的《清朝通史》12 卷 14 册即将付梓，作为全书的总主编，谨赘数语，以为前言。

自清末迄今，近代的清史研究已经走过 90 多年的风雨历程。经过几代清史学者的辛勤耕耘，清史研究已经取得长足进步，尤其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学术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传统史学、实证史学中的唯心主义成份被抛弃，在继承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史学界全面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地位，清史研究随之进入一个更加科学、更加理性的新时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学者们高度重视从经济形态和阶级关系的角度考察清代历史，学术界关于满族社会形态的研究、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对清代阶级关系的分析，从根本上改变了清史研究的面貌，使人们对清朝历史的认识，从历史的表象进入到深层，从上层建筑深入到经济基础。这一历史性转变，不但扩大了人们的学术视野，而且加强了清史研究的科学性。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 20 多年，既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清史研究取得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思想在解放，研究方法在更新，研究领域在扩

大，研究水平在提高，清史研究逐渐形成充满朝气和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断代史著作的大量出现，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郑天挺《清史简述》、鄂世鏞《清史简编》上编、戴逸主编《简明清史》、李文海主编《清史编年》、戴逸和李文海主编《清通鉴》、李洵、薛虹主编《明清史》、郑天挺主编《清史》上编、王戎笙等《清代全史》等。这些著作尽管风格不一，观点也不尽一致，但学风严谨、勇于创新是其共同特点。此外，一些中国通史的清史部分，资料翔实，结构完整，也可以说是高水平的清史断代史著作。如蔡美彪主持撰写的《中国通史》第8、9、10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编《中国史稿》第7册，等等。上述这些断代清史著作都能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从综合性的角度，全面把握清史发展的脉络，探寻治乱盛衰的根源，反映了当代清史研究的水平^①。

我们这部《清朝通史》，基本上借助于传统纪事本末体的体例。不同之处在于我们采用专题的形式，以史论结合的方法，对于清代自兴起到灭亡300余年历史中所发生的、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军政大事，逐一进行比较翔实的述论，既考订人物、事件的来龙去脉，又有专家学者的点睛之评，目的在于以这批学者积年所得撰写的这部著作，使读者清晰地了解清代历史的盛衰之变，从中受到启迪，并推动清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清代历史，如果从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军入关代明而立，到辛亥革命（1911年）清朝被推翻，前后有268年；如果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算起，前后有328年；即使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建元称汗算起，前后也有295年的时间。在这段历史时期中，清朝

^① 参见高翔：《五十年的清史研究》，《清史论丛》1999年号。

经历了孕育、发展壮大、鼎盛和衰落的过程；在这段历史时期中，中国历史也经历了由古代到近代、由独立的封建主权国家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过程。为了充分展示清代历史的盛衰之变，揭示其经验教训，本书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写起，直到辛亥革命（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

作为《清朝通史》附录的《清史图典》12册已经先行付梓。《清史图典》收录了近5 000幅与清朝历史相关的图像，其中有1/3是第一次见诸出版物。这些图像，或藏之于皇宫，或散失在民间，或流落于海外，我们尽力予以搜集和筛选，意在通过文字和图像相结合，使读者对清朝历史有一个感性认识，加深对清朝历史的理解。

全书由朱诚如教授任总主编，并负责总体设计、规范体例、撰写总序、全书终审。各分卷实行分卷主编负责制。具体分工如下：第一卷主编朱诚如教授；第二、第三卷主编阎崇年研究员；第四卷主编李治亭研究员；第五卷主编王思治教授；第六卷主编为冯尔康教授；第七卷主编周远廉研究员；第八卷主编张玉芬教授；第九卷主编喻大华教授；第十卷主编马东玉教授；第十一卷主编余同元教授；第十二卷《大事记》主编孟宪刚教授。对于参与全书撰写工作的各分卷主编和其他学者的通力合作深致谢意。

为便于读者核对资料，本书的注释采用篇目和页码相结合的方式，每卷在首次使用某种史料时均注明版本，如“《清史稿》卷一四三，《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77年”、“《清高宗实录》卷一四八四，第833页，中华书局，1986年”等。

本书中的数字表述一般采用阿拉伯数字表述方式，但也有某些篇目为庄重计保留了汉字表述方式。谨做此说明。

由于清史时间跨度较长、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又头绪繁多，真正动手写作的时候颇觉踌躇，好在及时得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南开大学、北京社会科学院、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等学术单位众多学界前辈和师友的支持和鼓励，从而使我们有信心把这一工作进行到底。在此我们深表谢意。同时，由于该书体例目前还只是一种尝试，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因此希望得到诸位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我们还得到文化部、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著名学者启功先生为本书和图典题写了书名，在此一并谨致谢忱。

朱诚如

2002年10月于北京

导 言

道光朝（1821～1850年），是清入关以后的第六个朝代，就延续的时间之长而论，在有清一代的历史上仅次于康熙、乾隆和后来的光绪朝。众所周知，此间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和清王朝的衰落期，危机四伏，各种矛盾十分尖锐。但是，若仅从表面上看，大清朝江山一统，金瓯无缺。勾心斗角的宫殿，巍峨壮丽的城阙，默默昭示着刚刚逝去的“盛世”的辉煌。在庙堂之上，臣子们卑躬屈膝，匍匐阶下，诺诺连声，盈庭称盛，将专制皇帝衬托得雄伟高大，熠熠生辉。道光帝依仗祖先的余荫，威风不减地稳坐金銮宝殿，比起杀人盈野、激烈竞争的太祖、太宗时代，骨肉反目、斗争险恶的顺康雍诸朝，道光朝不乏父慈子孝，君唱臣和的“祥和”的一面。总之，这些因素本来注定了道光朝应该是个较为平和，没有什么特色，不会给后人留下太多印象的历史时期。然而，偏偏是这个平庸的王朝遭遇了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鸦片战争，于是，道光朝便成了中国历史的“分水岭”，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性时期。

(一)

19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辉煌——康乾盛世淡出了历史舞台，盛世的霞光退去，取而代之的是黑暗与寒冷。这个成就空前，历时久远的盛世几乎耗尽了中国古代社会所蕴藏的所有能量，随之而来的萧条就更显得冷落逼人。曾有哲人言：成功是危机的开始。早在盛世的时候，高宗乾隆帝居安思危，一再告诫臣民要“持盈保泰”，以期盛世的久远，但衰败终于还是无情地降临了。

作为乾隆帝的长孙，道光帝无可选择地正处于这个走下坡路的时代，此间社会没落、王朝衰败，而又恰逢西方殖民者的东来，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对道光统治集团来说，真是雪上加霜般的内外交困。

危机首先来自统治集团内部，表现为国家机器的运转不灵，说到底就是吏治腐败问题。自乾隆后期起，吏治腐败越发严重，虽然嘉庆帝严惩了和珅，又一再整顿，但吏治依然不见好转的迹象。这表现在各级官员们一则怠惰偷安，因循塞责，玩视民瘼，往往是“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虑久远者，以为过忧；事兴革者，以为生事”^①。再则，各级官员亟亟营私，盘剥百姓，贪污中饱，层层分肥。“上司得其半，州县之人已者亦半，初行尚有畏忌，至一年二年，则成为旧例，牢不可破矣。”^② 百姓受此荼毒，控诉无

① 《清史稿》卷三五六，第11309页，中华书局，1977年，1996年5月第五次印刷。

② 《清史稿》卷三五六，第11314页。

门，往往因而激发民变。面对这种局面，嘉庆帝几经整顿，但终于付之无可奈何，致使这一局面延续到了道光朝。

此外，自19世纪起，清政府还面临着日甚一日的财政危机。一方面政府开源不力，国家经济停滞不前，传统经济制度百弊丛生，国库积蓄越来越少；另一方面由于边疆危机、人民反抗、外敌入侵之类的政治危机接踵而至。而且吏治腐败还增加了应对危机的成本，一时开支骤增，国家难堪重负。财政危机与政治危机形成恶性循环，令统治者痛心疾首，一筹莫展。嘉庆朝一则仰承盛世余润，再则清算了和珅，可算是一个经济“增长点”，以此苦苦支撑，勉强尚可维持。然而，道光帝将靠什么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呢？

同时，军备废弛也很严重。由于长期承平的社会条件，寄生的生活环境，使国初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八旗劲旅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八旗子弟”成了无能、无用的代名词。与八旗相比，绿营也是暮气沉沉，难堪大用。清军无强敌挑战，很少操练，不仅活力丧失，装备更是落后，有限的火炮数十年、上百年不发一炮，露天放置，腐蚀严重。当然，这支武装尚能勉强应付国内动乱，故在西方殖民者大举东来之前，清统治者还没有深切感受到这方面的危机。

经康熙以来百余年的发展，土地集中至19世纪前期达到了有清一代最为严峻的一个时期（咸丰后经太平天国运动洗礼，土地问题大有缓解）。据估计，地主占有全国土地的70%^①。尽管此时的土地兼并不像以往是通过权势手段而是以经济交换方式进行的，表面上还有一层金钱买卖的外衣，但大批农民失去土地仍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他们只能沦为佃户和雇工，甚至沦为流

^①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220页。

民。这又导致了阶级关系的紧张，社会动荡不安，农民起义不断。

然而，更严峻的考验则来自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挑战。

此时的欧洲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由此解放了生产力，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文明成果，这使其殖民野心进一步得到膨胀，航海技术的突破为其插上了翅膀。上自新兴的企业主，下到破产的流浪汉，都企图到神奇的东方寻找意外发财的机会。于是，在传播文明，对异教徒进行圣战的幌子下，他们以极大的热情进行着殖民扩张活动。继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后，英国成为这时世界殖民活动最积极和最有力的国家。在乾隆朝，英国基本完成了对印度的殖民征服，并在南亚扩张势力，号称“日不落帝国”的世界霸主英国得陇望蜀，将眼光投向了中国。

当时，遥远的中国对西方人来说还充满了神秘。在13世纪，马可·波罗对中国的描述令西方人既难以置信，又颇为向往。后来，传教士不断来华，发回了关于中国的报道：

中国分为十五省，据勒贡提神父所述，最小的省份也是这样的富庶和人烟稠密，足可以自成一个大国。

我曾经看到过七八个城市，都比巴黎大，这还没有把那些我没有见到的城市计算在内，据中国地理所载，这些城市都是同样大小的。

居民过度拥挤，全欧洲的总和也没有这样多的人家。

中国的海军并不重要，付诸等闲。^①

^① 世界史资料丛刊，辜鸿高等选译：《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大陆诸国》，第84～91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

这些议论除了证明马可·波罗所言不虚外，在此时殖民主义东来的背景下起到了激发西方人对中国进一步产生探索欲和占有欲的作用。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向中国派出了马戛尔尼使团，携带价值一万多英镑的反映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礼品”，企图朝见乾隆帝，说服其同意开放中国。可悲的是他们在广州一上岸，就被清政府误解为补祝乾隆帝80寿诞的“贡使”，受到盛情款待。后因英使坚决不同意向乾隆帝行跪拜礼而使双方关系紧张。虽然英使提出了割让舟山，进一步开放通商等要求，但遭到清政府的断然拒绝。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再次派遣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重申前意，但嘉庆帝接受以往教训，决定在将该“贡使”礼节调教娴熟后再予赐见，但无奈最终没有“调教娴熟”，结果这个使团连提出要求的机会都没有得到就被驱逐。

这两次中英接触，被后来的学者称为“地球上最强大的聋子之间的对话”^①。对于英国使团的挫折，今天的学者们心境是复杂的。虽然英使无功而返，但绝不意味着中国是胜利者。现在看来，随着世界潮流的发展，中西交往已不可避免，中国结束闭关锁国状态也仅是个时间问题，这就要求统治者在变动的世界里确定自己国家的位置和发展模式。然而，在当时的体制下，这种设想不管痴人说梦，清统治者只能遵循固有的模式，结果埋下了中西冲突的一个远因，决定了清政府在遭遇西方殖民者打击时必然陷入懵懂和被动状态，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必然要经历多次挫折和一场大变局。

^① 佩雷菲特著、王国卿等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19页，三联书店，1993年。

尽管困难重重，但英国占有中国市场的欲望并未改变，只是面对陌生、庞大的中华帝国，一时尚无断然动武的决心和勇气。当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野心的膨胀，其勇气也在不断增强。19世纪初，英国舰船在中国沿海巡弋，刺探情报，制造事端，来华商人也不断向政府献计献策，鼓动对华使用武力。当时，对华怀有野心的不仅英国，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法国、美国，均覬覦古老、庞大的中国，企图在变动的世界潮流中攫取在华利益，使中国成为其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市场和原料产地。俄国则企图占有中国北方的领土。尤为严重的是，昧于世界大势的清政府对席卷全球的殖民浪潮一无所知，对迫在眉睫的危机毫无察觉，依然陶醉在天朝上国抚育万邦的梦境之中，并为重现盛世的辉煌进行着徒劳的努力。

(二)

道光朝是中国百年社会变革的起点和开端。此间，清政府的政治前途一方面受制于王朝衰落的大势；再则，受制于中国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的时代大势，这说明统治者已面临着一个与古代社会迥异的新时代。但道光君臣依然沿袭着古代的政治理想与传统，按祖宗成法治理着不断变动中的中国，在政务方面见不到新的气息。

即位之初的道光帝也想拨乱反正，为此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采取了种种措施。鸦片战争前，他勤政图治，召见臣工，批答奏章，日以继夜，20年如一日。凡遇贪官污吏，均能严惩不贷，但由于贪官甚多，制度不改，精力有限，不能遍惩，最终无补于大局。鸦片战争后，进入暮年的道光帝转而苟安姑息，整饬吏治偃旗息鼓，吏治腐败不复问矣。另外，道光帝倡导实政，迫

于形势，也做了一些改革，但拘泥小节，未有大变。咸丰帝即位之初，在昭示耆英等人罪状的谕旨中，赫然有曰：“方今天下因循废堕，可谓极矣！”^①这可视为是对道光朝30年内政的最终评价。从后来太平军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即将大半个中国的清政权打得落花流水这一事实来看，清政权确实已经“废堕已极”了。

在道光帝统治期间，鉴于国家经济的困顿，他在节俭上很下工夫。他克勤克俭，力戒浮华，身穿带补丁的衣服，平时御膳不超过四样菜肴，嫔妃非节庆不得食肉，至于外出巡幸、木兰秋狝、营建宫室、梨园声色更是不去追求。但是，也应指出，道光帝的节俭主要是节省了自己，社会上梨园声色，饮食精美，变本加厉，盐商、官员生活豪奢，为其梦想不到。而不该省的偏偏去省，就不是节俭，而是吝啬了。譬如，在鸦片战争中不断裁撤军备，以节糜费的例子屡见不鲜。总之，一个大国的君主不去开源兴利，只是斤斤计较于减膳、“打掌”这些小节，难免舍本逐末之讥。

道光帝不是昏君，却是一位平庸的君主，缺乏力挽狂澜的魄力、能力以及对时局的洞察力。他谨小慎微，目光短浅，注意小节，故只能任用同样谨小慎微、目光短浅的曹振鏞、穆彰阿等专坏大局之辈。此间政治舞台上虽然涌现出了陶澍、林则徐等杰出人物，但道光帝对其不敢放手使用，对龚自珍、魏源等思想界的精英更是备加冷落。他虽然倡导实政，有时也支持诸如漕运、盐法方面的改革，但难有大的动作。总之，道光帝是一位循规蹈矩的皇帝，他施政治国，一法祖训，任何兴革，均不愿尝试，在位期间，勤政图治，孜孜不倦，大臣中贪渎者不敢肆其虐，才干者无法逞其能，朝野上下“万马齐喑”。

^① 《清文宗实录》卷二〇，第294页，中华书局，1986年。下同。

平庸的道光朝也不乏闪光点的出现，平定张格尔叛乱就是一例。新疆古称西域，清时亦称“回疆”，是祖国的固有领土，但由于远离中原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而且民族、宗教问题较为复杂，故动乱较多。此时边吏疲玩，得罪边民，加之外族播弄，遂于嘉庆二十五年爆发了张格尔之乱。新疆清军不支，致使叛军连陷城池。几经周折，道光帝挟祖宗余威，决定大举调兵平乱。尤其是东北的上万清军横越整个北部边疆，从长白山麓直扑天山脚下，征尘不洗，即穿插阻隔，围歼叛军。清军连战皆捷，最后生擒张格尔，扬威西域，红旗报捷，午门献俘，在祖国的统一历史中添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再如此间的禁烟运动，是中华民族永世可引为自豪的事件。鸦片流毒中原，为国家、民族之大害。道光政府立场鲜明，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虎门销烟规模之大，焚毁毒品数量之多，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在欧洲人不视中国为文明国家的时代里，道光君臣在禁毒方面给“文明”的西方人上了一课。当然，鸦片最终禁而不止，禁烟运动后来偃旗息鼓，令人浩叹。这既有政治腐败的因素，也有西方国家破坏的原因。另外，尤其应该看到禁毒是世界性的难题，即使在今天依然困扰着许多国家，在当时的政治、技术条件下，没有国际社会的理解、配合，要想取得禁毒斗争的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般说来，道光朝禁烟运动的失败是由于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是道光朝的“分水岭”，而道光朝也因此成了中国历史的“分水岭”。这场战争导致了中国历史的转折，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以前，中国还处于古代社会，但是，自此以后，古老的中国逐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

第一，在清朝历史上，已经千疮百孔的“盛世”画皮终于在此时被彻底揭去，任何掩饰都无济于事，清王朝无可奈何地向深

渊堕落。

第二，中国终于结束了数百年的闭关锁国，开始向世界开放。根据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约的规定，清政府不得不废除了垄断对外贸易的“公行”制度，同意进行自由贸易，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地为通商口岸。从此，闭关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利弊交织的，深远、复杂、全面的影响。

第三，在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国家。但在战后，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国家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占了香港，取得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这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关税主权、司法主权、领海主权，中国开始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第四，从1840年开始，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革命进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代。

总之，道光朝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是中华民族沉沦和觉醒的起点，中国历史进程发生了剧烈的转折，由此反映着道光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分水岭”地位。正因如此，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者将此时确定为“中国古代史”的结束和“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附带指出，鸦片战争的惨败并不应都归咎于以道光帝为首的清政府。这是一场不得不打的战争，也是一场战则必败的战争。以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技术水平、军队实力，绝无取胜的可能。但是，关键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当中国历史进入新时代之时，道光帝对统治政策有所调整吗？有振作的表现和改弦更张的愿望吗？

今天看来，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并不是一件大事的结

束，而是一个大变局的开始。对此，当时士大夫中也有人认识到了这一点，但道光帝的认识则恰恰与之相反。当他听到英军撤出长江的消息后，立即下诏命令沿海各省裁减军备，以节军费。此后，有大臣提出制造军舰、火器的建议，道光帝也没有表示过支持。

鸦片战争后，中国不得不与许多原本十分陌生的国家相处。在这种情况下，据说社会上一度是“儿谈海国婢谈兵”^①，此语多少有些夸张，但了解西方确实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而道光帝除了在鸦片战争中曾经打听过“究竟该国周围地方几许？”“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外，此后再没有表现出任何了解世界的欲望。

鸦片战争历时2年多，耗费3 000余万，签订了史无前例的丧权辱国条约，这巨大的代价使道光帝获得了什么教训呢？战争结束后，他把几乎所有的主张抵抗的大臣和主张妥协的大臣都送上了刑部大堂，处以严厉的刑罚，他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臣子，认为自己最大的教训就是用人不当。1842年的秋天，他在召见军机大臣时，“谕及英夷，辄以用人不明，深自悔恨，至于握拳捶心”^②。可见，他没有认识到时代的不同，制度、技术上的差距，使用的还是古代的思维方式。

在鸦片战争后，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明确提出了学习西方的主张，规划了具体的学习和引进西方技术的方案，该书曾经为日本人所翻译刻印，并对其维新志士有所启发，但在鸦片战争后的十余年间，未在中国产生任何影响。

可见，以道光帝为首的清政府并未认识到鸦片战争在中国历

① 魏源：《寰海后》，《近代诗一百首》，第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② 《李星沅日记》上册，第432页。